

记王桐龄先生

隋树森

王桐龄先生（1878—1953）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我在师大时读的是国文系，虽然听过王先生的中国史，但接触不多。几十年来，王先生培养出来的学生，真是桃李遍天下，王先生逝世转眼就三十年了，我很想写篇文章悼念他，但是我对王先生所知道的甚少，说实在的，我没有给王先生写传记的资格。

不过，关于王先生的生平事迹，总也要简单地写几句，然后再写我要写的东西。

先师王桐龄先生，河北省任邱县人，号峰山。生于清朝末年将要废科举办学堂的时期，他还赶上了科举考试，在青年时期考取了秀才。后来在莲池书院读书，考取京师大学堂，选送日本留学，由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从民国元年就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北京师范大学任课，直到全中国解放。我考入北平师大是民国十七年（1928），记得那时我选修了王先生的“中国史”。不过王先生的大名我早就知道，因为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购读过王先生编的《东洋史》。那时，《东洋史》只出了上中两册，好像后来一直也没出齐。

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乃至北京的教育界，好象是有派系之争的，初入大学的学生，说不清楚这些。当时我和王先生没有特别接触。记得当时我在某杂志上看到一篇批评王先生《中国史》的文章。在一次下课时候，我善意地告诉了王先生。王先生听了之后，却好象很不高兴。王先生也好象并没看到那篇书评。他有些

生气地说：“我的讲义只在学校里对学生负责，校外的批评我不管。前几年就有马××批评过我的讲义，我就持不理睬的态度。这些批评往往有派系的观点，我要过太平日子，不和他们争辩。现在中国通史就有我这一部，打倒它就没有了。”他又说：“梁启超先生的学问，我们总不能不佩服吧。然而他到北大讲课，学生就反对他，这是多么不公平！这不是门户之见吗？”那时候，以社会发展史代历史的讲课法刚刚抬头，“古史辨”派也很受人重视。王先生对史料特别熟悉，听讲的学生也很不少。我记得我听了一年，也许两年，把王先生的《中国史》听完了。王先生的书，那时好象只出了三本，清代部分还没有出版。

王先生的书甚得梁启超的称赞，梁先生在他的书的正文之前有一页题辞，是“成一家之言”。

说到梁启超先生，我想插叙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上一班的一位同学告诉我的。他说，我还没进师大的时候，有一年梁启超先生在师大讲《中国社会史》。梁先生讲课时没有详细的讲稿，只有提纲。梁先生讲书，常常引经据典，往往引《四书》《五经》。梁先生要引书中某一段话，当然深知其内容。然而背诵呢，却往往背不出来。王桐龄先生当时虽然已是师大的教授，却也和同学们一齐听梁先生讲课，梁先生在背不出某一段书的时候，总是点王先生的名，“请峰山先生背背。”王先生听了就站起来向听讲的同学高声背诵，几乎背得一字不差！

“九·一八”事变以后，北京的教育界相当混乱，师大历史系也很复杂，峰山先生好象有点儿受排挤，他这时再一次东渡进修了。当时留日的学生多起来，北平男女两个师大合并了，男女两师大去日本留学的学生也不少，所以王先生在东京的寓所，不时有“执经问难”的中国留学生。这只要看后来王先生印的一部旧诗诗集《尚俭堂诗存》里面的一些赠答诗等，便可知道。

一位留日的师大同学，曾经对我说：王先生在东京帝大是有

很高声誉的。他说，东京帝大的中国研究生，有的不必经过入学考试，即可入学。但也有些条件。就是有六个中国大学（北大，清华，师大，南京中央大学，广州大学，另一个我忘了）的毕业生，只要有帝大认可的学者负责介绍即可。王桐龄先生就是帝大承认的介绍者之一。北平师大的毕业生，只要得到王桐龄先生的介绍信，总可入东京帝大研究院的。

1937年七月，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大规模地侵略我中国，囊括我大好河山，侵吞我禹甸神州，很快控制了北方数省，建立了血腥的统治。

这时候我自己愧未能投笔从戎，奔赴疆场，却在大后方的四川避寇。有一年我们住在川东北碛，那是当时的一个文化城，师大同学约有二十余人。我们有机会就探听一下沦陷区的情况。有一回，西北师范大学（即战时北平师范大学迁往者）的校长李云亭（蒸）先生和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先生因公赴青木关教育部，路过北碛，我们师大同学给他们开欢迎会，云亭校长就把沦陷区的北平师大的情况谈了谈。他说日本人找徐祖正先生——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我在师大读书时，他讲过“文学概论”，他是苦雨斋主人的好友——出来任师大校长，徐先生不肯做，而以“佯狂”对之。日本人又找王桐龄先生任校长，王先生素以“尚俭”知名。尚俭本是一种美德，而有些人把尚俭误解为吝啬，错认为王先生一定喜好“功名利禄”，一定会接受日本人的安排，给日本人做文化汉奸。殊不知王先生是受过民族传统教育，熟读《四书》《五经》的人，他正气凛然，决不肯为博得一个大学校长，出来给日本人服务，推行奴化教育。王先生始终不就这个职务，他宁可拿一点些微的“钟点费”到私立中国大学教几点钟的课，藉以糊口。日本人想先任王先生以师大校长，然后再作安排的目的，始终没能达到，日本人后来还派宪兵队到王先生寓所去检查过，看看王先生是否同抗日分子有什么联系。

云亭校长把峰山先生在北平坚决不任日伪统治下的师范大学校长的事向同学们说了之后，大家对王先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识了他那尚俭的美德。王先生并不爱“不义之富贵”。他决不肯做汉奸！即使是“文化”的。

王先生不仅一身正气，不仅尚俭，而且他也十分勤奋！

就在他不肯充当日本汉奸，洁身自好，隐居在北平西城的一个“而无车马喧”的小院里的时候，他闭门著书、译书，写了大量的文字。

峰山先生早年已经出版的重要著作，如《中国史》、《东洋史》、《中国历代党争史》、《儒墨之异同》、《尚俭堂诗存》等，久已传诵艺林，这是人们知道的。先生还有脱稿未出版的著作，尚有《日本后视察记》、《突厥民族史略》、《朝鲜史》、《日本史》、《中国民族史概说》、《读史指南》、《碧梧存稿（诗）》等。写到这里，我不禁老泪直下，我连同所有的读者将永远读不到王先生这些未刊稿了！

然而这仅仅是峰山先生遗稿的一部分，最使我痛心的是先生的一大批译稿的损失。这些译稿，就是日本占据北平，王先生不肯做日本文化汉奸的时候翻译的！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回到南京前国立编译馆工作。大约在四十年代的后期，有一天，我忽然接到峰山先生的一封信和一部译稿。

峰山先生虽是我的老师，但他素日和我并不通信，历史一科是我在师大读书时的副系，我和峰山师的接触也并不多。先生的信，主要是令我代他向当时编译馆的领导人接洽一下，看看这部译稿能否给出版。这部译稿的原本是日本一位有名的史学家作的。但到今天事隔四十余年，想起来恍如隔世，书人名人名我都记不清了。编译馆的当局同意出版这部书，稿费好象也寄给王先生了，但是出书的日期却不能说。当时编译馆自己并没有印刷

厂，无论要出什么书，都把稿子交给商务印书馆印，后来又添了一家正中书局。如果这两家书店不给印稿子，编译馆就无法可想了。而当时通货膨胀，已经到了国民党的末日，印书不如囤积纸张赚钱，王先生这部译稿，也就没有出版的机会了！

但是著译人总是想以他的著译问世的。王先生还在整理他那些译稿。记得后来王先生又寄给我一大包稿子，这大概是他在隐居时期的全部译稿。这些文章的原文，多半是发表在日本著名书刊上的。如《改造》、《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史学杂志》、《东洋学报》、《东洋史论丛》、《历史学研究》、以及那些有名的汉学家、史学家的“还历纪念”。如《桑原博士还历纪念》、《池田博士还历纪念》、《山下先生还历纪念》、《市村博士古稀纪念》、《内藤博士还历祝贺》……这些书刊，在日本史学书刊中都是第一流的。至于作者，如和田清、内藤虎次郎、市村瓊次郎、鸳渊一、铃木俊等，也都是日本有名的专家。我记得王先生译稿的目录就写了满满的好几张纸。但是时间太不合适了，正当解放战争进行得十分激烈的时候，书店那里还顾得上印书？印出书来还有谁读？所以王先生这批译稿，尽管我向编译馆领导人推荐了，而领导上迟迟不能解决是否印的问题。后来还好，南京和平解放后所有编译馆的书稿和正中书局的一部分书稿，连同编译馆的全部图书，都由北京出版总署派员前往接收，东西都运到北京了。

王先生的稿子，经过解放战争以及种种波折，能够全部安全地保存下来自然是很可庆幸的事！我到北京以后也就到峰山先生那里禀告了。后来王先生看了看当时出版界的情形，自己也认为自己的译稿一时不会有出版的机会。

王先生在师大前后工作了四十年，已是七十余高龄的人了。有一天先生对我说：他这些译稿一时不能印，他想存放到师大图书馆，也许比较妥当些。要回这些稿子，当然也要费些手续。

王先生知道我那时不过是出版总署图书期刊司的一名小小编辑，办这件事怕不易，于是托了林砺儒教授。林先生多年担任师大教育系教授兼附中主任，五十年代初担任中央教育部的副部长。后来通过林先生把这部分译稿都要回来了。

王先生这时身染微恙，我去王先生府上看望他，我总说先生的高寿已经超过了孔子，将来超过孟子是不成问题的。谁想到1953年先生竟与我们永别了！

先师崑山先生临终的时候，总是惦念着他那些尚未问世的著作和经过了许多周折，好不容易回到自己手中的那一大包译稿。不过，先师也许会想：自己坐臯比而主讲于最高学府者，已数十年，培育出来的学生很不少。在他归道山之后，不怕没人给仔细整理和设法刊印自己的遗稿。然而，先师如何能预知后来有一个“十年动乱”，以致遗稿被抄掠一空，至今一直没有下落呢！

先师的弟子确实很多，决然不只“三千”。然而在遗稿全然无存的情况下，谁也无法负起给遗稿加以整理和出版的光荣责任！写至此，我不禁怆然雪涕。

（上接166页）

语言要会比较，善于从运动发展的观点分析语言学问题。此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基础、智力、特长各不相同，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有的放矢地总结出一套学习方法。

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办的“庆祝王力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的大会上，蒋南翔同志在讲话中指出，王力先生在高等学校执教五十多年，他是我国高教界既笃于教学、又勤于著述的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一个典范。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王力先生几十年在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王力先生年逾八旬，壮心不已，他在诗中写道：“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他按照制定的工作计划，在坚持写作，将会有更多的学术著作问世。